

P2 边城爱情的变与 P3 无从驯服的野马
不变
乡下人沈从文
上善若水

P4 诗意的生命
俱为女子

【编者按】一双脚似乎生来便是要走他个东南西北的。心之所向也好，命之所移也罢，我们流动的一生，总在离家，归家。于此离合之间，便又生出诸多情来。你也知道，在外者，不免爱比对自己，一比，就剥落出东西来。写乡土文学者，仰山水纯灵，或斥俗民愚困，抑或乡心温朴，皆可。这些从时空里混摸出来又浮荡在时空之外的情感，只有我们经历了才更深刻明白。本期，小编同你一起体悟乡土文学的各式“暧昧”。

中文新世纪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总社
■ 刊头题字：李文海教授
■ 团宣准字：09-0240 号
■ 投稿邮箱：zwxsj2007@163.com
■ 网站：http://www.zwxsj.com.cn

■ 总第 112 期
■ 指导老师：黄彦菲
■ 社长：原 源 冯海敏 吴林华
■ 主编：欧莫若 肖羽彤 许鑫辉
■ 出版日期：2014 年 3 月 9 日

【鲁迅】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世界。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周作人】

尼采在《察拉图斯特拉》中说，“我恳愿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我所说的也就是这“忠于地”的意思，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

《地方与文艺》

【严家炎】

它的作者大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或者是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以及早年《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的青年作家，少数则是基本倾向与文学研究会十分近似的语丝社、未名社的成员。较早的潘训，一九二二、二三年就发表了《乡心》、《人间》、《晚上》等乡土气息虽不浓但却颇为朴实真挚的短篇。继起的许杰、许钦文、廖彦、徐玉诺、王思玷、蹇先艾、彭家煌、台静农、黎锦明、王任叔等，各以其写故乡生活的若干作品（其中颇有圆熟出色之作），受到读者的重视。叶绍钧自《隔膜》起，也在表现苏南村镇乡土民情方面取得可



图 [法] 米勒《拾穗者》1857

喜的进展（如《金耳环》、《外国旗》、《遗腹子》）。连后来变得愈来愈怪诞的废名（冯文炳），早年写的《竹林的故事》、《浣衣母》等，其实也是乡土小说。以文学研究会成员为主的这个作家群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流派终于形成。

二十年代还只是中国乡土文学的

形成期，但它为后来乡土文学的发展尽了开辟道路的作用。不同籍贯的作者，写不同地区的生活，而能构成一个流派，这只能在新文学发展初期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随着创作倾向的不同，实际上作家们已经分道扬镳（如京派、社会剖析

派），而且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成就更多地集中在中长篇方面（像沈从文的《边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萧军的《第三代》、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到四十年代以后，更朝向具有地区特点的流派（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发展。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冯光廉，刘增人】

由于经历、气质和师承的不同，他们于自觉不自觉中渐渐显示出三种各具特色的审美趋向。多数作者，自觉地取法于鲁迅小说，忠实地摹写现实农村的生活画面，把针砭社会弊端、揭露国民精神病态和乡风民俗的传神写照

融为一体，洋溢着忧患意识，侧重于写实风格，作家的爱憎往往潜隐于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的深处。这是乡土文学的主干，或者说正宗型范——写实型。另一些作者、作品，以鲁迅的《社戏》等为源头，或者怀念故乡农村的质朴平静，或者续写童年真情趣、家族轶事，抒情意味和主观色彩相当浓郁，作者往往化身为“我”直接介入情节，大大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审美品格，是为抒情型。废名是一个特例，以牧歌情调而自成家数。

降至三十年代，随着农村阶级斗争的激化，农民的苦难日益深重，农村的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加以俄苏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影响，写实型遂充实、成熟为乡土文学的主体，王统照的《山雨》乃集其大成，获得了史诗的品格；抒情型乡土文学几成绝响之后，1940年萧红完成于香港的《呼兰河传》，忽然遥相呼应，把这一形态的审美品格发展到极致，划上一个寂寞而美丽的句号；沈从文则把废名的田园牧歌圆熟地演化为“边城”神韵，成为牧歌型走上成熟、也走上结束的神来之笔。《山雨》、《呼兰河传》、《边城》，分别把二十年乡土文学的三种审美趋向，发展为三种成熟的风格，为现代乡土文学铸出三种互补的型范，显示了新文学在不同时期的规律性发展。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

【王光东】

乡土文学作家们“一方面从审美的、艺术的角度，认同民间的魅力，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封闭、落后与愚昧。在他们看来，民间中虽然包含着与启蒙思想相通的精神内容，但在其现实层面上却应该对其进行批评和提升”，表现出了“对民间文化形态以及对体现民间文化形态的民间文学的二元态度”（《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中国现代文学解读》）

更多乡土文学见 2\3\4 版……

new books



《小窗幽记》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随笔

本书由明代陈继儒所撰，陈桥生评注。分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卷，计一千五百余篇，是一部辑录式的清言小品集。以“醒”为第一，在“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之时，无异于醍醐灌顶，一声棒喝，还原出一个本真的自我来。所以“醒”后言“情”，令千载向慕；“醒”后能“峭”，卓立于千古；“醒”后获“灵”，而百世如睹。一番洗刷之后，方能悟得“素”趣，会得佳“景”，品人生之“韵”，显生命之“奇”。其“绮”也，能尽红妆翠袖之妙；其“豪”也，能为兴酣泼墨之举；其为“法”而超越于世“法”之外，其赏“倩”而限于一般“倩”意。故罗立刚先生称，清醒之后，经此一洗刷，真是俗情涤尽，烦恼皆除，人生的价值，才真正显现了出来。幽窗青灯，潜移默化，灵魂得以纯净，那小窗之“幽”，正是一种惊喜，更是超越后的清闲和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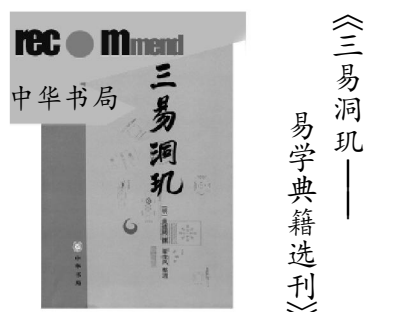
《旧日笺》
中华书局
民国文人书信考

本书由龚明德所著，考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书信内容。作者选了诸如徐志摩、叶圣陶、丁玲、梁实秋、林语堂、茅盾、郭沫若等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共三十四篇。侧重于选择在以往的出版物中没有出现过的，或者是被编入文集但是对书信的内容、时间、人物解释有误的。作者对错误做了重新的考证，并且还同时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做了介绍，读来非常有趣。



《中国香学》
中华书局
本书是国内著名香学专家贾天明所著的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香文化专著。全书从中国香学概念、中国香学发展简史、宋代以来中国人对沉

香气味爱好的嬗变轨迹、香材、品香的方式和香、香与茶、香与佛教、香与家居生活、品香的感悟和境界、香学论述精要摘录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香学这一脉古老、特殊、美妙的中国传统文化。



《三易洞玑》
中华书局
易学典籍选刊

黄道周（1585—1646），明末易学家，相关著作有《易象正》（中华书局推出了整理本）、《三易洞玑》、《易本象》。《三易洞玑》凡 16 卷，内容依次为《必图经纬》上中下、《文图经纬》上中下、《孔图经纬》上中下、《杂图经纬》上中下、《余图经纬》、《贞图经纬》上中下。黄氏思想秉承朱熹道统，与晚明刘宗周并称“二周”，是晚明理学的殿军式人物。其易学受汉代今文经学天人感应思想影响较大，颇多神秘气息。《三易洞玑》于《四库》归于子部术数类，是象数易的代表作品。书中较多采用天文历算知识，以历解易，易历相融，从而推布历史，体现了黄氏独特的易学思想。此次整理，以上海图书馆藏明刻

本为底本，以清郑开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为校本。



《唐代的诗人研究》
中华书局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这是由日本芳村弘道所著的关于唐代诗人研究的论文集。第一部分主要收录盛唐、中唐时期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王昌龄）的传记和文学方面的论文，第二部分则关于白居易的传记以及白居易与李商隐之间关系的论文和考证构成。



《芬克勒问题》
上海译文
本书是英国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 2010 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小说围绕三个单身男人——特雷斯洛夫、芬克勒和利博尔——展开故事；特雷

斯洛夫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前 BBC 广播制作人，而他的同窗发小山姆·芬克勒是一个有名的犹太哲学家、作家和“电视嘉宾”，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利博尔。三个男人现在都孑然一身，却各有各的困惑和烦恼……作者雅各布森最擅长描写犹太裔英国人的困境，并以此题材创作喜剧小说而出名，他的写作风格睿智幽默、辛辣讽刺，自诩为“犹太裔的简·奥斯丁”。



《林中路》
上海译文
本书是 20 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已被视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作品，是进入海德格尔思想的必读之作。本书汇集了作者 30、40 年代创作的六篇重要文章，几乎包含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所有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是海德格尔围绕“存在之真理”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本质的沉思，以及海德格尔独特的“存在历史”观，也即对西方形而上学以及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观点。



《未来是一只灰色的海鸟》
上海译文
本书完整收录了美国著名的当代女诗人、女作家，1982 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全部正式诗作。普拉斯的诗充满了强烈的意象性，几乎每一首诗都包含了足以勾勒出一幅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画作的元素。这些比现实飘渺，但比梦境严酷的画面组合毫无顾忌地违抗所有的逻辑，因果乃至时空的束缚，解构众神与基督、圣哲与贞女，看似无可理喻，但这一幅幅荒诞、颠倒、时空倒错的画面所传达的焦虑、受挫与被压抑的欲望却是如此地令人心悸、过目难忘，这是任何悦目的色彩都无法企及的。



边城爱情的变与不变

——浅谈《边城》人物设置的对应结构

■ 张婉茹

一、前言

《边城》中人物不多，有名有姓的更是屈指可数。在这些角色中，沈从文似乎有意暗设了一种对应结构，将这些人物一一对应：翠翠母女为第一组，翠翠父亲与傩送为第二组，而第三组则由杨马兵和天保组成。从表面上看，这整齐对应的人物设置仿佛是作者筹划的一场“轮回”。然而，两组人物之间仍有许多差异，这种“对应”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再现”。在人物对应结构中，反复出现的情节，暗示着作者一以贯之的审美观和情感态度，而两代爱情中的不同与变化，则真正阐释了沈从文在《边城》中的想说之话、欲抒之情。

二、文本探究

翠翠母女是这两代爱情故事中的灵魂人物，沈从文对其着墨最多，在她们身上寄托的情感也最丰富、深刻。在《边城》中有一个设置值得思考，那就是沈从文反复描写翠翠母女与老船夫的关系密不可分，这种亲密和依赖似比一般父女、祖孙更为强烈。《边城》中第一次提及翠翠母亲的故事时，这样写道：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人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娶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狠，一同去死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1]

这段描写中有两处细节耐人寻味。其一，当翠翠母亲与军人相爱后，沈从文写的是“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其二，当谈及翠翠父母想要私奔时，翠翠母亲担心“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这两处独独只谈“爸爸”、“父亲”，而不提“母亲”或“父母”，作者实际上是在暗示，老船夫是一位“单亲爸爸”。读者可以了解到的是，因为单亲的缘故，翠翠母亲与老船夫相依为命，他们彼此的依赖比普通父女更为强烈，这也为翠翠母亲后来放弃私奔的决定作了情感上的解释。这种亲密关系在翠翠与老船夫身上也有所体现。在此仅举两例。

例一是在端午节当天，老船夫想让翠翠去城里看热闹，而翠翠却希望老船夫也能去，两人因为这件事僵持不下：

“祖父说：‘翠翠，我不去，你同小狗去好不好？’
‘你要不去，我也不想去！’
‘我去吧？’
‘我本来也不想去，但我愿意陪你去。’
祖父微笑着，‘翠翠，你陪我去，好的，你陪我去！’”

例二则是翠翠与老船夫聊天时的对话：

“‘爷爷，你不快乐了吗？生我的气了吗？’
‘我不生你的气。你在我身边，我很快乐。’
‘我万一跑了呢？’
‘你不会离开爷爷的。’
‘万一有这种事，爷爷你怎么样？’
‘万一有这种事，我就驾了这只渡船去找你。’”

《边城》中类似情节还有许多，可

以看出翠翠与爷爷的关系异常密切。这种关系构成了《边城》人物对应结构的一个基本框架，即，老船夫是两代人之间的一条纽带和对称轴线，他将两组人物牵连起来，形成一个对照关系；同时老船夫与翠翠母女的紧密联系，也为母女俩在爱情与亲情的抉择中所表现出的犹豫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此外，这两对老人与少女的组合还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态度：一老一少，实则是沈从文心中“美”的具象化，“天真未凿，但很快将要迈入成人社会的少女；陷于穷途绝境，但仍肯定生命价值的老头子——这都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世界”^[2]。

翠翠母女有许多相似之处。作者描述翠翠有“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性格又是“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而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眉毛长，眼睛大，皮肤红红的。也乖得使人怜爱——也懂在一些小处，起眼劲眉毛，使家中长辈快乐。”母女俩有着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此外，两人都遭遇了种种悲剧：在爱人自杀后，翠翠母亲生下翠翠，“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翠翠也未能和所爱之人相守，又须面对爷爷的离世。

作者两次借老船夫之口，暗示了母女二人的相似之处。一开始，老船夫想到翠翠未来的爱情，有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担忧：“如今假若翠翠又同妈妈一样，老船夫的年龄，还能把再下一代小雏儿再抚育下去吗？”^[3]此时故事主要情节尚未展开，作者却先写老船夫担心翠翠将来和母亲一样不幸，这看似有些不合常理，实际上作者是在暗示读者，翠翠和其母有着如此相似的天性性情和情感特质，也许也会有与母亲相似的命运。第二次是老船夫发现翠翠喜欢的人不是天保而是傩送，有些慌张，“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象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4]。

第二组人物是翠翠父亲与傩送。首先，沈从文专门花费笔墨描写两人的外貌。傩送“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睛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实在是“美丽得很，茶峒船家人抽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诨名为‘岳云’。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岳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岳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而翠翠父亲，在老船夫口中则是“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他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如何使女孩子动心”^[5]。此外，两人在《边城》的爱情中都无法获得圆满的结局。翠翠父亲在明白无法与翠翠母亲私奔之后，服毒自杀；而傩送则是在父亲的反对以及哥哥之死的困扰下，最终选择远走他乡。沈从文将两人都设置成爱情中的成功者与失败者，“成功”在于他们获得了所爱之人的心，“失败”则在于相爱却无法相守。此外，作者还设置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两人都是唱歌好手。从老船夫的描述中，翠翠知道了父亲“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释爱与憎的结子”；在天保与傩送的对话中，天保说到：“这（唱歌）是你的拿手好戏，你要去做竹雀你就去吧，我不

会捡马粪塞你嘴巴的。”^[6]由此，翠翠父亲与傩送之间也形成了明显的对应关系。

最后一组是杨马兵与天保。两人都是爱情中的失败者。天保的爱情故事无需赘述，杨马兵的爱情却是沈从文在《边城》的结尾才加以描写。原来杨马兵曾经以唱歌的方式向翠翠母亲求爱，遭到拒绝。当老船夫过世后，杨马兵在白塔下陪翠翠，他突然想到“自己年青作马夫时，牵了马匹到碧溪咀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的母亲不理睬，到如今这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相较于翠翠父亲与天保两个唱歌的好手，杨马兵和傩送却不是歌喉动人的‘竹雀’。天保曾经自嘲：“一个结巴人话说不出还唱得出。可是这件事轮不到我了。我不是竹雀，不会唱歌”。讽刺的是，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天保在追求爱情时请杨马兵作了自己的媒人，而后者却是爱情中彻彻底底的失败者。这种关于“失败”的反复再现，大约也是作者刻意设置的细节。

三、两代人的对比

通过文本分析，可以肯定《边城》人物设置存在三组对应关系，而这六个角色又组成了新老两代爱情故事。唯有将两段爱情故事结合起来进行对比，才能真正理解沈从文寄托在《边城》中的情感与态度。

首先，这两段故事有许多共性，即，强烈的情感，以及爱与死亡相伴相随。

在《边城》中，沈从文不断强调人物情感强烈，爱憎分明。他反复使用“爱憎”两个字来概括小镇人民的情感态度，力图勾勒出这群有爱有恨的人物形象。在此举三例说明沈从文专情于“爱憎”二字的使用：

(1) 在这小城中生存的人，各人也一定皆各有分定一月份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

(2) 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3) 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的事情上驰骋。

此外，主人公们的人生轨迹也可印证沈从文对于表现人生强烈情感的偏爱。例如天保，当他得知翠翠喜欢的不是自己时，他选择的不仅仅是退出，而是更极端的远走他乡。天保死后，傩送认为自己哥哥的死与老船夫脱不了干系，于是对其态度彻底转变，也无法接受自己和翠翠在一起，最终也选择离开家乡。似乎《边城》中的人从不会在爱与憎之间选择一个折中的态度，他们的情感表达往往很直接甚至极端。沈从文曾经说过：“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7]他试图去“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8]。

这两段爱情另一个共性便是爱与死亡的共存。在沈从文如诗的描述中，故事仿佛进行得平静。但事实上翠翠的父母先后自杀，天保遭

遇意外不幸身亡，老船夫在接连打击下突然过世，傩送因为家庭与自己情感的原因决定远走他乡。这些情节都与“平静”、“天然”毫无干系。两段爱情实际上充满了痛苦和死亡。这种爱与死亡并存共生的情节设置反复出现，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态度。王德威认为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爱欲时常现身于孩童般的天真之中，同时孕育一种非理性的狂暴力量。这种热情发展至其极致，便构成（自我）毁灭和死亡的力量”^[9]，“爱欲的力量——无论表达于纯粹情色，抑或官能感受形式——强化到某种程度时，死亡的诱惑——即对一切存在物的弃绝之欲——便尾随而至”^[10]。这种“弃绝之欲”与主人公痛苦的爱情经历相一致，通过一种极端的选择，主人公（甚至作者自己）可以从中获得解脱和释放。

沈从文曾感叹：“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1]。由此可见，沈从文真正想要诉说的是“热情”与“悲痛”，而这“热情”与“悲痛”正与上文总结的“强烈的情感”与“爱与死亡并存”的特征完全一致。

这两段故事有以下三点差异：不同的悲剧根源，不同形态的情感，以及老船夫前后相反的态度。

首先，翠翠父母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们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无法结婚，这也许是湘西特殊的社会制度，但书中并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在沈从文另一个短篇小说《萧萧》中，也有相似的情节：主人公萧萧未婚先孕，于是祖父“把萧萧关在房里，派两人好好看守着，请萧萧本族人来说话，照规矩，看是‘沉潭’还是‘发卖’？萧萧家中忍要面子，就沉潭淹死了她，舍不得死就发卖”^[12]。这里的“按规矩”大约和翠翠父母遭遇的“规矩”类似，未婚先孕的女人也许被沉潭，也许被卖到外地，因此翠翠父母作出私奔以及自杀的决定也就可以理解。可见，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容的社会规则所导致的。在翠翠的爱情中，我们看不到一个坏人，也看不到什么阻拦人们相爱的残酷的社会规则，但是翠翠的爱情却仍是悲剧的结尾。天保的死是彻底的意外，老船夫虽然受到了傩送迎娶富家女假消息的刺激，但不能说这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而最后翠翠与傩送的分离更是说不上是谁的错误。由此，这一代的爱情成为了“偶然”与“不凑巧”的悲剧。

“社会”的悲剧与“偶然”的悲剧实际上反应了第二个差异，即新老两代人不同的情感形式。翠翠父母在未获得社会认可前就有了亲密关系。对于情感冲动，他们有着原始而天然的态度。翠翠父母从未过多考虑社会性的因素，如名声或门当户对等。然而翠翠的爱情却恰恰少了这种原始性。翠翠从不直接表达自己对傩送的爱意，她会羞涩，会隐瞒，更愿意被动等待爱情的到来。而事实上也正是翠翠这种暧昧的态度，使得老船夫不断猜测，无法确定应该向天保还是傩送示好，最后“阴差阳错”反倒让傩送以为他做事不老实。

第三个差异便是老船夫态度的变化。在翠翠父母的爱情中，老船夫选择顺其自然的态度。当他得知女儿怀孕的事情后，“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

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但这种态度却换来了女儿的自杀，老船夫虽不愿意去将这件事推罪到他人身上，却感到不公平。因此在翠翠的婚姻爱情问题上，他决定主动参与其中，“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给他的，翠翠长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他的事才算完结”。然而即使如此，老船夫的努力仍旧没能促成这段姻缘，反而与傩送有了嫌隙。在新的爱情故事中，“偶然”与“不凑巧”代替了社会性的制度导致了爱情的悲剧，爱情中的男女也不再只有原始性的情感冲动，他们开始具备一些社会化的情感特征。

作者尽心去创造一个“偶然”的悲剧，这种情感诉求相较于一般的爱情故事显得有些特别。在《水云》的创作独白中，沈从文透露了关于《边城》写作的一些想法。作者渴望“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面对现实生活中已经获得的名利、爱情和婚姻，他仍然觉得似乎有些东西没有完成。他仍“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来消解和中和这些情绪。于是他开始创作《边城》，在这个故事中“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13]。

早年从军的经历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沈从文对“偶然”的认识：《沈从文传》中提到了沈从文与文颐真韵的故事。文是军队中的文官，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将沈从文带入了文学世界。然而不久文颐真便在一场战役中丧命，他的突然出现与离世令沈从文感到“人生有点稀奇，有点神秘，让人眼目迷乱。他无法弄清各种事变的前因后果，‘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在军队中生活了几年，沈从文“看到了‘时间’的古怪，一切人一切事全在‘时间’下被改变。死去的不由自主地死去，活下来的，又去接受一份新的命运”。沈从文在北平也遇到类似的事情。在好友胡也频被暗杀之后，沈从文发现了玲另寻新欢。在《记丁玲》中，沈从文表达了自己矛盾的情感：“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回避？但所要的何尝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边的又何尝不恰恰是这讨厌的？”^[14]因此如果由作者的生平来看，早年看惯“人生无常”的军旅生涯也许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沈从文的创作审美和情感表达，而北平的生活经历又强化了这种情感倾向，最终他将这种对“偶然”和“无常”的困惑不解投射在《边城》的一山一水之中，试图将其中和。

但这只是对沈从文创作动机的一种猜测。事实上，当被问及是否试图在《边城》等作品中表达人生莫测的命运论之时，沈从文极力否认，称自己“没有那么高深寓意”。关于《边城》的直接创作动机，解志熙就指出：“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沈从文在《边城》中所暗寓的个人隐衷，如刘洪涛就指出‘《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情感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15]，《边城》的写作的确是沈从文对婚外情诱惑的缓释和逃避，但文本的叙事却无关于婚外情，而着重表现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人在婚恋上的“不凑巧”之错失以及因此而生的感恨与希望并存的复杂感情。^[16]

沈从文这样解释《边城》：“我要表

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至于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西水流域一个小城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17]。这段话阐释了沈从文真正想讲述的秘密——“人生”与“爱”。沈从文试图通过构建两组对应人物关系来支撑起“人生”这一主题的框架，而两代人物之间相似又不同的经历便是这“人生”的内涵，人们在边城生活，相爱，爱与憎也随之出现，强化、消散、复生，周而复始却又有所变化。“爱”与“死亡”、“痛苦”紧密相连，两代爱情的主人公们不断对“爱”这一永恒的主题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注解。纵向来看，两代爱情正是对小镇“人生”与“爱”最佳的阐释，爱憎的反复强调，生与死的一体两面，边城中的人有着自然而强烈的情感特征，横向来看，年少懵懂的翠翠、热情莽撞的大老二老与阅历丰富的老船夫之间的对比、爱与婚姻，他仍然觉得似乎有些东西没有完成。他仍“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来消解和中和这些情绪。于是他开始创作《边城》，在这个故事中“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18]。然而在《边城》中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而“爱”则是联系彼此的关键。但边城的“爱”却不是普通的，它与自然浑然一体，因而也包含了自然中无处不在的“偶然”。因此对于边城的人来说，“偶然”是生活之常态，“人生”与“爱”无时无刻不面对“偶然”的出现，即便如此，边城的人们仍不改他们的爱与憎、哀与乐。这种纯粹的情感追求正是沈从文渴望获得的并热情抒写的，这种纯粹天然的情感正是沈从文对人类“爱”作出的一份恰如其分的说明。

四、结语

《边城》中隐含的对应人物结构为沈从文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叙事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作者尽情书写小镇生活中的爱与憎、哀与乐。《边城》中那种纯粹、自然、强烈乃至极端的情感态度在两代人的爱情故事中得以体现。在对比新老两代人生活际遇的过程中，作者一步步向读者展示乡下人的“热情”与“悲痛”，以及自然、健康的“人生”与“爱”。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边城集》，岳麓书局 2002 年以下有关小说的引文均出于此，不再另注。
- [2][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3][5][9]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 9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版。
- [4]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72 页。
- [6] 沈从文，《沈从文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77 页。
- [7]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年，第 132 页。
- [8] 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 10 期。



无从驯服的斑马

■ chen

沈从文是20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他14岁就从军行武，20岁后来到北京，开始品读社会这大本书；他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未上过大学，却因文学成就卓著而登上高校的讲台，晚年他又成了文物专家，的确是个奇迹；他一生命运多舛，却又一直是边缘人物，可这边缘的视角和边缘的心态，却造就了一个个迷人的艺术。

一、成就沈从文的边城凤凰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湘西凤凰城。要想了解沈从文，就要先了解湘西凤凰城。湘西处于湘贵交界。在这里，宗教的潜流波及到这里，愚昧、纯朴、多民族共存，这些都赋予其神秘色彩。这里的人强悍、野蛮但也忠诚、圣洁、不虚伪。同样也是一种个人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结合为一体的游侠精神，铸就这地方人格与道德的另一种典范。

凤凰城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凤凰是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交界的地方。尤其在清代以来，汉族对苗族的镇压以及苗族的反抗一直是不间断的。而凤凰作为重镇，它也不断有汉人迁徙过去，也是作为以军队的方式过去的。沈从文的祖父是从武的，后来也到贵州做过官。在凤凰有个传统，对军人或者善于打仗的，他们是非常崇拜的。

凤凰古城沿革清晰，历史悠久，古城风貌相对完整，文物古迹众多，自然景观奇异秀丽，楚巫文化独树一帜。凤凰古城至今还保存着戏剧“活化石”傩戏，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光彩照人。沱江两岸，矗立着一幢幢古色古香的吊脚楼，城中店铺林立，随处可见明清风韵的染坊、银号、商铺、酒坊，身着民族服饰的摊贩散布其间，构成一幅悠远深长的湘西社会的生活画卷。

深厚的文化底蕴，浓烈的民族风情，神奇的山水大地孕育出享誉文坛的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民国总理熊希龄、著名画家黄永玉……大师的故乡凤凰城，吸引着众多的文学青年来此寻梦，他们的来与留、见与闻、感与悟，使湘西凤凰城从沈从文笔下翩然而出，飞向世界……

二、文学大师永不安心的灵魂

沈从文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入私塾，12岁入模范国民学校，因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当补充兵。15岁就离开家乡，跟随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统治时代，他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在一起，亲身体验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杀害无辜的百姓。过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的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好人好事、风土民情，为后来创作打下了结实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影响，毅然离开湘江，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嫌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他很生气，又去报考燕京大学，又被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读大学。他决心拿起笔来写文章，依靠自己来谋生活，从而开始了人生的拼搏。后来北大当图书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得到郁达夫和徐志摩支持和鼓励。

1922年开始以“休芸芸”的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还与胡也频等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沈从文是在“五四”时代这么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这种性格，“五四”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思想的、精神的自由状态，在个性张扬的时代，再加上他湘西人的性格，使他在走进文坛之后，不管你的地位高低，不管你的成就高低，都敢于发表自己的个人看法。这就是三、四十年代真正的沈从文。欣赏他在三十年代的那些作品，不仅有我们印象中的《边城》或《湘行散记》，还有大量充满着刚阳之气的各种杂文，对社会的批判，对文化的批判，非常之多。包括后来在“京派”、“海派”的争论中，“反差不多主义”的论证中，那些言论大都是非常有锋芒的、有战斗性的。



上善若水

■ 梨花小魚

文学是一种美，历史考古也是一种美，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距离，沈从文毕生追求的就是美。他晚年醉心于文物研究，对服饰、瓷器、锦缎丝绸、旧版经文，多有心得。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林林总总，巍巍大气，像他的小说一样，流动着祥和之美。他对文物中呈现出的人性的魅力，别有心得，像他的创作一样天然无伪，自成一格。在历史的隧道里，他寻觅到了精神的墨汁，且写下了考古史上动人的华章。沈从文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只有不安分的人，才有可能为这个世界创造出那么多优美的作品，才能使他永远洋溢出生命的活力。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的一篇未完成作品，他说：“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情形，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心机。”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病故于北京，享年86岁。1992年，他的骨灰在亲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的五彩石下，他的墓碑刻着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三、永远洋溢出生命活力的《边城》

1934年，沈从文发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它代表了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在小说里，沈从文用自己的理想将边城加以美化，表现出了那种静穆和谐、远离喧嚣与骚动及与此相适应的古朴醇厚的人情美。有人说，沈从文就是从家乡的田地里拔出一株野菜，带着泥土，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餐桌”上，别人想学也学不好，可称天下独步。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实、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中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边城》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船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沈从文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体现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其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更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边城》给人的是什么？宁静的生活、醇厚的人情和正直朴素的人们。加上那个诗情画意的美好自然风光和地方色彩，使人在为美好的人性而陶醉时，给人一种情感和色彩的双重美感，此外，还带有一点忧愁一点快乐，还可以慢慢地接触人物的情绪和作家的感情，那不会使你堕落。爱的感情和恨的感情，引起人们对于人生向上的憧憬。一种特有的不易于形容笔墨的隐忧。对于遗失的美好的东西的怀念和无可奈何的惋惜。

因此，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之后就应该是沈从文。



又翻出沈从文先生的散文。犹如在风里雨里辗转漂泊数圈之后，重新回到了自己可爱的家乡。“河水已平，水流渐缓，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山谷中不知何处有鸡叫，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必有成畦的白菜，或相间以红萝卜。”

沈先生的散文形式上大多清波如绿茶，温润如古玉。若以浮躁的心情粗略一看，想必大多数人的感觉会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没劲。”沈先生的行文中，永远没有也不需要哗众取宠和故作惊诧。一切皆源于天然。惟有沉心静气细细品读之后，方觉其山光水色，暗香深藏。他的文字，是越品越味深，越读越入心。

《沈从文散文》一书是按类别分成“怯步者笔记”、“南北风景”、“湘行书简”、“湘行散记”等四部分的，而没有计较时间顺序。但读者只要稍稍细心，就能清晰地感觉到沈从文散文的风格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阶段特点。

二十年代初期，他极年轻，胆怯、腼腆、自卑、神经质般地敏感，再加上生存的无奈、现实的黑暗、世态的炎凉以及爱而不得的失落与迷茫，所以那时候的文章中多一些令人

乡下人沈从文： 在安静的角落里安身立命

■ 湘音湘情湘水长

当年，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曾在信里对张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沈从文一直把自己当作“乡下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乡下人所独有的优秀品质。

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中断了一切文学创作，这主要是因为左翼文化界对其作品的妖魔化以及众所周知的各种政治风波。面对这样的歪曲，当时的沈从文几乎处于“疯”与“狂”的思想精神状态。“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这是《从文家书》中《吃语狂言》的一段文字。文字中所映射出的两种状态实在太悬殊了，整个世界的状态和个人自我的状态简直截然相反。从身旁“识时务者”主动追随时代潮流要求“进步”的眼光看来，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所具有的木讷和静止无疑是很“疯狂”的。

沈从文不仅“疯”而且“狂”，“疯”是指刚开始经历扭曲指责时茫然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而“狂”则是之后思想意识十分清醒的状态下所独具的无所畏惧的勇气。“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肉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这段文字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具有很大的预见性，这至少说明沈从文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脑子却是异常清醒，而不像身旁世人那般昏昏睡且又辨不清是非。

之后，沈从文选择了历史博物馆和古代文物艺术研究，与静止的坛坛罐罐打交道。相比于其他地方，这里自然安静了许多，可以更少地与人打交道。这样的选择是符合“乡下人”沈从文的性格的。我们无法揣摩到一个以创作安身立命并有伟大文学抱负的人在终止文学创作后会有多么痛苦。沈从文仿佛把这种痛苦转移到了古文物的研究上，他没有单纯地把历史博物馆当作一个避风港，而是大有作为。难以想像，当旧日同行满面春光时，沈从文却每日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博物馆门还没开时就坐下来看星星月亮，听来不免让人感到落寞和悲凉。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所具有的勤、笨、诚，她从事着文物工作，整天在库房里转悠着，转悠了二十多年，接触了大量的文物，这样真实而又朴拙的办法着实弥补了一直以来文物界以书注书而缺少文献和文物互证的缺陷。



苦闷的矛盾，多一些喃喃的低诉和痛苦的挣扎。但是，被生活遗弃的艰难辛酸并不能阻止他对现实丑态的讽刺与批判，更没有磨灭他骨子里的自尊、倔强以及对未来的梦想。在《水车》一文中，他讽刺走狗般的“匣子”（汽车）：“不仅跑趟子快慢要听他腰背上那人命令，就是大起嗓门吓人让路的声音，也得那人扳它的口。穿靴子其所以新，乃正因其奴性太重，一点不敢倔强的缘故，别人才替它装饰。”同时他借水车的口写自己对生活的不屈与乐观：“因失望而悲哀的是傻子。我的歌，终日不会感到疲倦。”

那个时候，除了自己在“黑夜”里唱歌外，他还经常站在洋槐树后面倾听自己心目中的女神那“生着一对银白薄纱般翅膀”的歌唱！

二十年代沈先生的文字犹如梅花玉镯，戴在那个时代的腕子上，黑色底子里鹅黄透亮的梅花，是闪烁的星星，温婉、高洁而坚强地照着寂寞的夜行人。

而晚年沈先生的文字则笔法极其简净，风格如带有九只眼睛的天眼玉髓，平和、圆润之极亦绚烂之极，更充满了大智慧。“鸟鸣山更幽”——这真是稀世的天籁。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生于中国湖南省凤凰县，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不少人认为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沈以其小说、散文创作著称，最著名的为其小说《边城》，散文集有《从文自传》、《湘行书简》。

沈从文一直把自己当作乡下人，他仿佛有些瞧不起知识阶级，这从其晚年未完成的一篇题为《无从驯服的斑马》中可见一些象征意味。与当时知识阶层所拥有的闻风而动的本领相比，他这个乡下人则显得质朴诚实许多。毫无疑问，这种对比，更凸显出了沈老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在当时巨大的政治风波下，沈从文选择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在这个角落里他并没有苟延喘息，而是安身立命。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这些书简集中写在1934年1到2月沈先生去湘西老家探亲的往返途中。因为是给自己最亲爱的妻子，所以笔法尤其自然，情意尤其绵密、深切。还有不时跳动的顽皮。一封封书简，犹如一朵朵出水芙蓉，那种天然的淳美，是无法言喻的。正如行走在山中，突然看见一群野鸢或云雀在大石头上散步、对歌，那时你还敢出声吗？“嘘！”且让我们一起侧耳倾听……

沈先生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温和、蕴藉、平常中深藏着巨大的惊人的智慧和力量。正如他的表侄黄永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他(沈从文)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记得老子曾说：“上善若水。”我想，老子所说的，必定是指沈先生这样的人。

1988年张艺谋把红地毯一路铺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台阶,《红高粱》在中国电影史的地位不言而喻。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丝毫不掩饰激情的中国红像,浪潮般地冲击了在一片黑暗中观影的我。所有诗意的激情幻化成无数铿锵有力的鼓点,在心脏最饱含生命张力的地方奏响了一曲激动人心的乐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在回归现实的潮流中,已经酝酿着对生活实录更本质的表现。从对长镜头的记录功能的强调,到散文化形态电影的渐成风气,影像审美的魅力楚楚动人。^[1]

影片没有一处性写实,却处处充满性暗示,写意的手法如诗一般美丽动人。狂风中起伏的高粱地中出现的蒙面人,奶奶凌乱的脚步,绷紧了影片的节奏,设置悬念。而这种暴力的错觉,强化了爷爷的男性力量。当爷爷摘下蒙面,跪在躺在高粱地上的奶奶面前时,性爱变成一种仪式。俯瞰镜头仿佛来自神性的目光传达对人类关怀和深深的赞誉。当人类的生殖繁衍与自然融为一体,贴近生命本原的力量喷薄而出,如同初升地平线的日头万丈金光让人目不暇接。奶奶在这片霞光中仰下身去的特写谱写了一首抒情小诗,女人的娇柔妩媚与男人的刚劲强硕相得益彰。鼓点铿锵响起,仿佛送君出征,再一次强化性爱的仪式性。当激昂的唢呐声响起,不仅凸显了仪式的庄严性,更吹响对人类原始生命力的礼赞。红高粱的摇曳身姿完成了一次次对这场生命仪式的膜拜,动态的空镜头中生命在天地间奔涌融合。

在罗汉爷爷的追悼仪式上,代表罗汉爷爷的那碗熊熊燃烧的高粱酒,燃起了生命的生生不息,不屈服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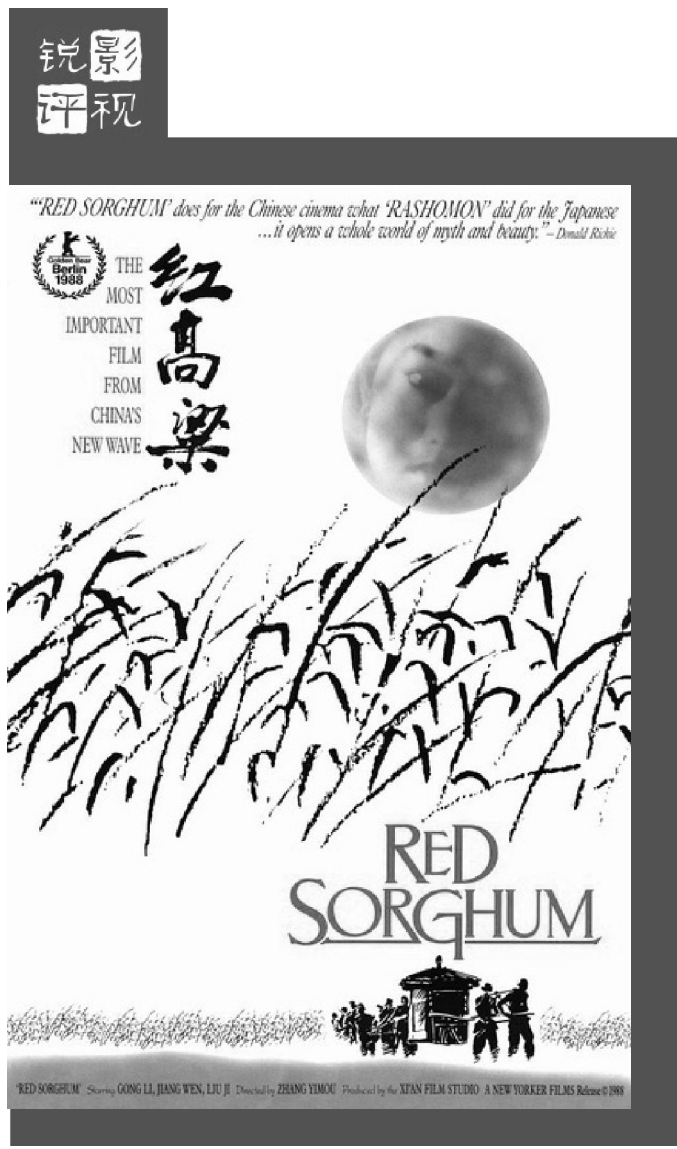
的光芒璀璨地映衬在每个烧酒锅人的脸上。死变成生的延伸,影片站在死的角度去赞颂生,如同片尾豆儿在一片沉寂的黑暗中(日全食)爆发的声声啼哭,一股破晓的力量将对生的赞誉带到另一个高度。苍凉而粗犷的黄色(通过人物造型和烧酒锅地理环境渲染)奠定了影片悲壮的基调,而张扬毫不掩饰激情的红色以一泻千里的姿态为这片位于黄河流域的土地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在苍凉的背景乐中为生命谱写了一首荡气回肠的赞歌。

在这样一部影像风格明显的个人化电影中,导演以贯彻始终的激情为我们讲述。影片节奏张弛有度,笔触刚劲有力而又不失温婉细腻,细节铺垫使得整部影片在讴歌的同时情节完满,真实可信。

我爷爷和罗汉爷爷是两个大丈夫。高粱地里柔情蜜意后,我爷爷高歌一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为我奶奶保驾护航。我们来分析分析这首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潜台词是有哥哥在背后保护你。“从此以后你撑起那红绣楼,抛撒着红绣球,正打中着我的头”。绣球既然打中我的头,自然不准李大头抢占你。歌词赤裸裸的野性背后是我爷爷毫不掩饰的男人的雄性,为李大头被杀埋下伏笔。我们来看看烧酒锅出酒这段。我爷爷在酒坛里尿尿,一个男人的霸气挑战烧酒锅男人的集体权威,当我爷爷为九儿出槽,一锹高粱抛洒在伙计身上,更是一种权力从上而下的覆盖。“十八里红”替代了老酒,至此我爷爷征服了伙计,也征服了九儿。当罗汉爷爷倒掉那碗为我爷爷端上的酒时,权力完成了从罗汉爷爷到我爷爷的更迭。一个大丈夫的塑造无一处

诗意的生命

■ 书 玟



拖沓,恰到好处。再来看看罗汉爷爷。不同于烧酒锅上男人的刚劲强硕,罗汉爷爷瘦弱精干。摄影机慢慢从一群伙计转向独坐于炕上另一头的罗汉爷爷,用一个全景镜头引出他的出场,强调罗汉爷爷的与众不同。在这个瘦弱的身躯里爆发出来的刚性,是精神与身体的反差,更为伟丈夫增添了一笔深刻内涵。伟丈夫的精神正切合了题目“红高粱”的寓意。这是在青杀口长出的一片无人种收的野高粱,生命力与野性不言而喻。还记得那首敬酒歌吗?“上下通气不咳嗽,滋阴壮阳最不同,一人站在青杀口,见了皇帝不磕头”;伟丈夫的强硕、生命力、勇气和骨气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拔节。

写意的手法为影片增添了诗意的美感,而多处隐喻则更增添了诗意的蕴藉。

九儿新婚之夜的一轮皎洁的满月,仿佛能看到月宫里的桂树。使我不禁联想起嫦娥独守广寒宫的传说,与新婚之夜映衬,其意不言而喻。月亮的意象第二次出现在罗汉爷爷追悼后,昏暗的天空挂着一轮残月,天上人间充盈着诡异凄凉的气氛。月圆一缺,立场可见一斑。

胡二原本是剥牛皮的,日军却让他剥人皮,在灭绝人性的日军眼里,中国人等于畜生。胡二的小徒弟剥完人皮后坐在荒芜的高粱地里发出阵阵惨笑的全景不断向后推移,一片沉寂的高粱地的空镜头流露出欲说还休的镜头语言,此时无声胜有声,却更加地掷地有声。

让我们在回到开头媒婆说的四句话:“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这便是影片一开头导演为九儿的命运埋下

的伏笔。当高粱酒散落一地,生命啪的一声陨落在他发生的地方,如烟花般绽放又消散。爷爷说他从此烙下一个病,眼睛看什么都是红的。导演大胆地尝试用一片庄严而肃穆的血红探索人物心理的创痛与悲伤,影像美学探索达到极致。大麻点翻翻眼的唢呐声再次响起,让我不禁想起九儿出嫁时同样是这支曲子。乐景衬悲情:此去今年,物是人非。

结束字幕时响起的那首高亢的唢呐曲子和铿锵的鼓点,那是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交欢时的音乐。这是一部让人喜悦的片子,虽然九儿这个象征人类得以繁衍的女性形象最终陨落,但我看到了生命的传承。当豆儿在九儿倒下去奔跑的一刻,从九儿的红棉袄到豆儿的红肚兜,从罗汉爷爷的敬酒歌到豆儿的敬酒歌,从十八里红中爷爷的尿到豆儿的尿,生命以另一种姿态得以延续。

张艺谋在回忆《红高粱》的拍摄时有段精彩的描述:“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蹿,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2]今天,烧酒锅的汉子把鲜血洒在这片高粱地里,听,拔节的声音……

注:

- [1]参考周星的《中国电影艺术史》第14页
- [2]参考 Mtime 网站关于《红高粱》的幕后花絮介绍 http://www.mtime.com/movie/10808/behind_the_scene.html#menu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

俱为女子,我原本却并不喜欢书中的翠翠。

十四、五岁时第一次读《边城》,就不喜欢这个与自己差不多同龄的女子。十五岁时的翠翠,在风日里长着,触目皆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活脱脱就是一个自然之子,有着原始的善良和纯真的可爱,应惹来无数爱怜。

可那时的我却不喜欢,觉得这个女子的纯真过了分,这是她保护自己的盾牌,也是尖锐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地刺伤了那些深爱她的人。她的不谙世事,她的含蓄懵懂,全变成一条条致命的引线,引向最终的惨烈。我的记忆里永远挥之不去的只有最后的悲哀结局,如同改编的同名电影里昏黄温暖的色调,隐隐透出烟水空蒙的凄寒。

这是我一直都不懂的故事,也是我一直都不懂的世界。作者笔下的茶峒山城在故事里仿佛真正成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安静角落。在那个风云变幻,改朝换代的时代中,不管别处的人们如何不幸挣扎,生死存亡的恐慌感都似乎永远弥漫不到这里。热闹充满生气的小河街,妇人聚集的吊脚楼,负责摆渡的老船夫,在难却感情地收下过客的一枚铜板后会回送其一大把的烟草叶。在那里,就连最不为世俗所容的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她们可以为了生计接待四川商人,也可以把所有的眼泪和快乐牢牢地系在归期不定的水手身上,有着古代女子“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勇气和无悔。这样的水土和民风养育出的翠翠,有我想象中的淳朴,却没有意料内的勇敢。她的那段伤痛初恋,在那时的我看来,这

不过是一个简约和克制导致的悲剧。

那时的自己,并不理解这样的含蓄,也不喜欢翠翠的纯真善良毫无机心,当这些品质成为一个人格的全部时,反倒失去了最基本的一点点可爱。于是,我离开这个故事,忘记翠翠,忘记湘西清亮的白河,继续经历自己的青春岁月。

时隔两年,因缘际会下我再次翻开《边城》,只因为怀念起湘西瓦蓝的云天。故事里的翠翠在成长,已经走到了自己命运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固执地等待,等着那个年轻人回来一同去采最喜欢的虎耳草。故事外的我也在长大,走过豆蔻年华,面临着少年走向成熟的蜕变。若说两年前这个故事让我感到的是温暖中透出凄寒,那么两年后我不仅感受到全篇无处不在的寂寞孤独,也更执著于其中几许温暖的色调,依旧昏黄,却足以照亮我的心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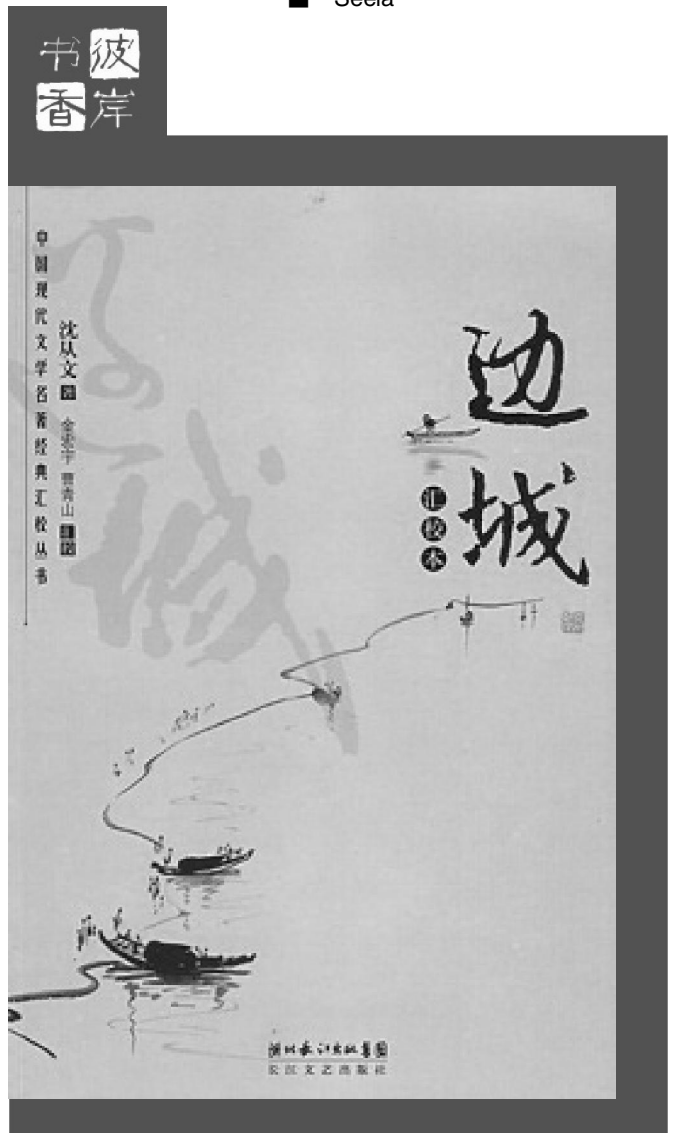
两年后的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俱为女子,翠翠却真是特别的。她不只是爷爷疼爱的对象、男子梦中的理想,也是女孩子心中永难消逝的情结。再读时,我不再指责她的懦弱隐忍,而是喜欢她的活泼率真,也爱她的含蓄。因为这才是每个这样年纪的女孩子心中最纯真的一面,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不过不同于我两年前理解的爱

俱为女子,而我心已消瘦

——再读《边城》

■ Seela



情,再读时我却对那两个男子的感情产生了小小的质疑。也许是着墨不多的缘故,天保和傩送的感情仅体现在一次又一次的求婚。翠翠的纯真美丽,是区别于其他女子的特别,也正是这份特别吸引了他们。可从始至终我都觉得他们只是把翠翠当成一件最美好的东西那样小心翼翼地追求,可以兄弟相争,可以唱一夜的山歌,可心底其实想要的在这一块纯净的水晶之外,还是一个节俭持家的女子。但愿这只是我对男子的偏狭。

可是翠翠,在这时却真的初尝到爱情的甜蜜,焕发出少女的光彩。她会在骂人后听到对方名号时“心里又吃惊又害羞”,沉默一个晚上,也会在爷爷提到嫁给天保时又羞又气地掐腿话头。而在面对爷爷正式讲起求婚时心念更是瞬间即是百转千回,她的心会轻轻地跳动,会即使不知所措也装作从容地等待爷爷的决定。而当心上的事落空时,此刻的心理描写尤为精彩:“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涨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豆角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地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她的惊愕和极度失望,以及妄图掩饰的心理过程,在看似随意的动作中暴露无遗。之后面对爷爷的泪水,她的心中又烦又乱,想哭又觉得没有理

由哭。就是在这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过去一直都不理解的事,翠翠并非不愿去大胆争取、大胆说出自己的爱情,只是自身少女含蓄的性格,以及对爷爷的顾及使她不知所措,只能以不回应的方式来回应。看似不合情理,却恰恰是人之常情。

而这种人之常情,却恰恰是当年的自己所不懂的,是谁说过“不哭过长夜,不能语人生”。我想没有经历过青春的甜酸凉薄,大概也不能懂《边城》。就好像当年老师在课堂上一遍又一遍的强调边城的民风淳朴,边城的珍贵难寻,当时的自己却只是不以为然。作者的语言的的确很美,平淡如水却自有芬芳,景物描写引人入胜,但是否就真的是独一无二?现在的我已经不会怀疑,面对尘世间铺天盖地的灰土,面对无处不在的窒息感,不再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自己,越发怀念起茶峒清澈见底的流水,桃花花里耀眼的紫花布,温柔的黄昏带着薄薄的凄凉。那样的世界,在素淡中自有明澈的光辉,质朴中自有蕴藉隽永之致,只能存在于过往,存在于梦中,存在于记忆,一去就永不再得。所以怎能忘记那山,那人,那只黄狗,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她的身上有着我最想抓住的洁净和自由,她的故乡是我穷尽一生也到达不了的远方。面对似乎再找不回的美好,心如何不念,如何不消瘦?

每个人心里也许都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作者如是,翠翠如是,我也如是。然后,我们都将余下的岁月留在了等待里,孤寂地等待。但即使等得眼已垂落,耳已闭锁又如何,毕竟似水的流年还在记忆里,曾经的梦想还在心里,闭上双眼往昔的温暖还一息尚存。

既然一切都还在,来过就未曾离开,那么即使心已渐渐消瘦,也没有什么是不可释怀的。